

生態翻譯視域下的譯文批評研究：以傑克·倫敦《熱愛生命》 兩中譯本為例

劉劍雯¹ 劉康龍²

Address: ¹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Hong Kong

²Department of Chinese &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E-mail: ¹jwliu@hksyu.edu; ²klliuhk@polyu.edu.hk

Correspondence: Kanglong Liu

Citation: Liu, Jianwen, and Kanglong Liu. 2020. “Translation Criticism from the Eco-translation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Jack London’s *Love of Life*.” *Translation Quarterly* 95: 21-34.

Abstract

Translation Criticism from the Eco-translation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Jack London’s *Love of Life* (by Jianwen Liu and Kanglong Liu)

Ecology has become a prominent scientific discipline specifically dedicated to the research of the survival and sustainability of human civilization, cultures and languages. The rise of eco-critical theories has provided translation scholars with new ways of thinking through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logy and translation activities. From an eco-translation perspective, translation is viewed primarily as a means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interpla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al ecology. Informed by this framework, we used the textual analysis methods under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ecocriticism to examine the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Love of Life by Jack London. By comparing the two translation versions in the three eco-dimensions of ecological holism, anthropocentrism and ecological aesthetics, we found that the ecological thoughts of the author and original work were to a large extent rewritten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eco-critical perspective can help to enric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一、從“翻譯生態”（Translation Ecology）說起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以來，翻譯這一研究領域愈來愈向跨學科方向發展，不斷借鑒周邊學科的視角、問題意識和知識範式並汲取各類學科的理論前沿知識和成果。比如出現了結合性別研究和翻譯研究的女性主義翻譯（如：Flotow 1997; Andone 2003; Castro & Ergun 2017）、結合科技和翻譯研究的計算器輔助翻譯、語料庫翻譯等等（如：Baker 1996; Tymoczko 1998; Kenny 2017）；近年來，更有學者把生態學的研究成果引進了翻譯研究，提出了翻譯生態學（許建中, 2009）及生態翻譯學（胡庚申, 2011, 2017; Liu 2011）。

無論是翻譯生態學，或是生態翻譯學，其起源可追溯至“翻譯生態”（Translation Ecology）這一概念的提出。克羅寧（Michael Cronin）在其 2003 年出版的著作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中，把翻譯生態的概念與全球化背景下的小語種及翻譯的角色聯繫起來，指出全球化的發展，暴露了地球上語言生態系統脆弱的一面，一些語種迅速消亡（Cronin 2003）。克羅寧指出要避免這種情況發生，翻譯這一文化中介應在全球化過程中發揮作用，既要發展多元文化，也須傳遞自身文化和語言的獨特價值，維護語言的多樣化，使語言生態系統免受災難。（許建中, 2009, 16）

據克羅寧所述，他當時提出“翻譯生態”這一概念，被一些中國學者所借用，切實地把翻譯和生態學聯繫起來。例如許建中的《翻譯生態學》（2009）便從生態學的角度審視翻譯，探討如何結合生態學來研究譯者的翻譯環境和翻譯實踐（Cronin 2017, 2）。這些研究探究翻譯現象，後又統稱為所謂的生態翻譯學（Eco-translatology），其研究的重點放在了“選擇”和“適應”等生態系統的概念與翻譯活動的聯繫上（同上）。如胡庚申的《翻譯適應選擇論》就借用了達爾文進化論中“適應/選擇”的原理，描述了譯文產生的過程，定義翻譯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胡庚申, 2004）；又如，劉愛華的〈生態翻譯學視角下的翻譯家研究〉（“An Eco-translat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Translator: A Case Study of Xu Chi”），也是從“選擇/適應”的角度去分析中國譯者徐遲的翻譯策略，指出他的翻譯乃是“適者生存”的結果（Liu 2011）。因而在國內學界，“生態翻譯”的研究多與“選擇/適應”等生態概念聯繫在一起，從進化論的視角把翻譯生態喻指為自然生態。

而西方學界關於生態翻譯（Eco-translation）的討論與以上不同。克羅寧在其著作 *Eco-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Ecology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Cronin 2017) 中，將其定義為“與人類引發的環境變化所帶來的種種挑戰相關的一切翻譯思想和翻譯實踐”（“all forms of translation thinking and practice that knowingly engag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2017, 2)。此“生態翻譯”的概念實實在在地結合翻譯與生態環境，討論的是人類的翻譯行為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說到底，克羅寧關注的仍是人類與環境的關係，只是作為一名人文學者及翻譯學者，他把“引發環境變化”（同上）的人類活動具體到由人類主導的翻譯活動上。這種論述體現了翻譯這一人文學科對地球環境的關注，也清楚指向了與環境變化相關的翻譯活動，討論的是翻譯作為信息交際手段如何影響人類與自然生態的關係。

人類生活在地球上，與地球息息相關。實際上，人類活動已經對地球造成了前所

未有的影響，有地質學者指出，地球已經從全新世(Holocene)進入了人類世(Anthropocene)(Crutzen 2002; Chakrabarty 2009)。在人類世這個由人類引起環境氣候變化的新地質時代，“人”從一個生物學的概念轉變為地質學上的概念，人類如今已經足夠有能力影響地球上的生物和生態系統(Cronin 2017, 9)，成為了“地質學上自然界的一股力量”(Chakrabarty 2009, 207)。人類作為一種地質力量在持續不斷地改變著地球，並對之施以不可逆轉的影響。(張旭鵬, 2019, 46)

在種種影響氣候變化的人類活動中，人們常常想到的是工業碳排放、森林砍伐或土地的不合理使用等，卻忽略了翻譯這一“不起眼”的事件。如今，生態翻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穎的視角來批評翻譯作品，讓我們重新審視由人類主導的翻譯活動與環境變化之間微妙的關係。

然而，克羅寧把生態翻譯概述為影響環境變化的一切翻譯思想和翻譯實踐(Cronin 2017, 2)，卻並無指出在翻譯過程中，可以影響環境變化的具體翻譯行為。筆者認為，對於一本以生態為主題的作品，可能得到忠實的翻譯，亦可能被改寫。常見的因素如譯者的生態意識、出版商的生態立場、譯本的出版年代、出版背景、社會大眾的整體生態觀等等，都有可能影響譯文的產出。換言之，譯本或增強原作的生態思想，或削弱之，或忠實呈現之。無論是哪一種情形，翻譯作為傳播信息的媒介，在向大眾傳播生態觀的過程中，必定會與環境變化發生聯繫。筆者用圖 1 來表示生態與翻譯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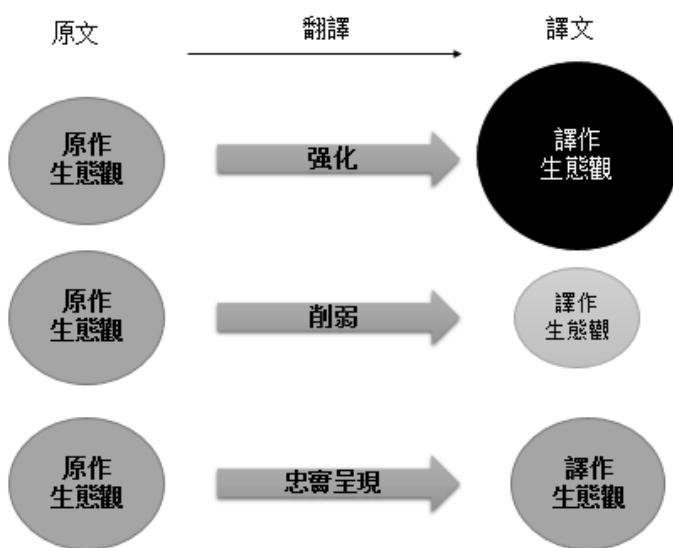


圖 3.1: 原作之生態觀在翻譯過程中的傳遞

如此，經過翻譯這一中介，原作的生態觀或得到強化（如譯本表現為更加尊重大自然、更有環保意識），或被削弱（如譯本淡化環保意識或漠視大自然），或得以相對忠實地呈現（即重現原作的生態面貌）。而不同版本的譯作若為其讀者所接觸，便有

可能影響受眾對於原作生態思想的解讀，進而影響受眾的生態觀，而影響整個地球生態。

二、生態翻譯批評

穆雷（2006, 45）指出，翻譯批評是“依照一定的翻譯標準，採用某種論證方法，對一部譯作進行分析、評論、評價，或通過比較一部作品的不同譯本對翻譯中的某種現象做出評論”。生態翻譯批評則是以生態理論視角作為切入點，針對翻譯作品的不同譯本中涉及生態的現象做出分析、評論或評價。本定義有別於國內生態翻譯學借助達爾文的“適應/選擇”進化論把翻譯生態喻指為自然生態，並在同構隱喻的基礎上研究翻譯現象。本文的生態翻譯批評將結合翻譯批評與生態批評，借鑒生態批評的理論架構來審視翻譯，主要考察在翻譯過程中譯本如何重現、重構或扭曲了原文的生態意識。

生態批評“揭示文化如何影響地球生態”（Levin 1999, 1098），探索人類思想、文化、社會發展模式如何影響人類對自然的態度和行為（張豔梅, 2007, 108）。目前學界的生態批評，多以生態的整體主義思想（Ecological Holism）為基礎，強調對自然生態的尊重，批判人類中心主義（如胡志紅, 2006; 王諾, 2007; 孟小果, 2017）。其主要切入點包括：生態整體主義、人類中心主義批判、科學主義批判、唯發展主義批判、生態審美等等（王諾, 2007, 168）。

結合本文所要分析的作品，我們特選取其中三方面來討論：1. 生態整體主義的思想；2. 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3. 生態審美。

生態整體主義“把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作為最高價值”（同上, 84），強調人與自然界是一個整體，人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並且兩者存在一種平衡的關係，人類應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

人類中心主義，概指一切事物以人類為中心。其定義包括以下三方面：（1）本體論層面而言，人是整個宇宙的中心，亦即在空間範圍的意義上，人類處於宇宙的中心；（2）認識論層面而言，人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目的，即在目的的意義上，人類處於宇宙的中心；（3）價值論層面而言，評價或解釋宇宙中的任何事物是按照人類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在價值的意義上，一切以人類的價值和利益為出發點，以人類為尺度評價和對待其他除人類之外的所有事物。（馮契、徐孝通, 2001, 1176）

生態審美，是指在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基礎之上，探求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身的和諧審美關係。（隋麗, 2008, 13）本文在此以一種通俗的方式來理解生態審美，即小說作品對大自然的審美志趣，比如是否對大自然的花草樹木、山水鳥獸等等持愛護欣賞的態度。

本文將從以上三方面入手，來分析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中篇小說 Love of Life 的兩中譯本。結合克羅寧所提出的關於生態翻譯的理論架構，本文所採取的生態翻譯批評模式如圖 2 所示：

如上圖所示，原作所包涵的生態思想，經過翻譯此中轉站，可能會以另一種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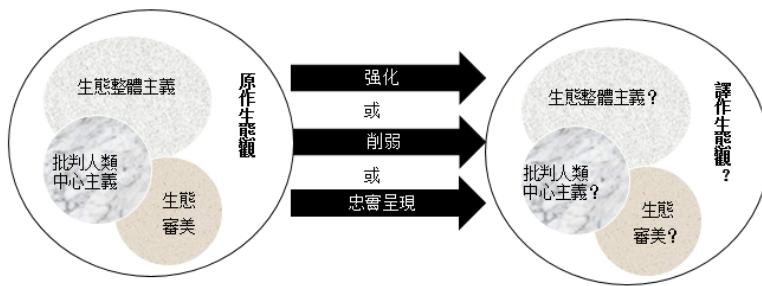


圖 3.2: 生態翻譯批評模式

出現。下面我們來比較原作與譯作，進而討論翻譯這一人類活動何以能影響地球生態。

三、《熱愛生命》簡介

此作品是倫敦的代表作，首次發表於 1907 年。展現了主人公在絕境下，以頑強的生命力，克服自然界的種種挑戰，最終倖存獲救的故事。文中有相當篇幅描寫大自然，如荒野、岩石、樹木、叢林、雨雪、野生動物等等，也描述了人類一旦脫離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便利，在可畏的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和無助。作者描繪了凍原，極地，礦闊、亙古不毛之地，人與獸的鬥爭，以及原始大自然的恐懼力量。（彭啟華, 1982, 90）

小說描寫人與自然，生態主題突出，適合作為生態翻譯批評的研究對象。在眾多中譯本中，我們選取了出版年份接近但譯文差異較大的兩譯本。其出版資訊如表 1 所示：

表 3.1: 《熱愛生命》兩譯本出版資訊

譯本	書名	出版社/年份	譯者
蘇譯本	《傑克倫敦中短篇小說選》	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16	蘇福忠
劉譯本	《野性的呼喚：傑克倫敦小說選》	臺北：如果出版/大雁出版基地發行/2014	劉曉樺

經比較分析，我們發現兩譯本在以下三方面存在差異：1. 在表現生態整體主義方面，蘇譯本傾向於把人與大自然對立起來，把主人公放在受害者的位置；2. 在批判人

類中心主義方面，蘇譯本表現出人類例外論（Human Exceptionalism）的立場，維護人類中心主義；3. 在生態審美方面，蘇譯本較負面地描述大自然，甚至帶有敵意。而在以上三方面，劉譯本則較接近原作，大致重現了原作的生態思想。通過考察以上文本差異，我們也可一窺譯者對大自然的解讀如何傳遞了其生態意識，並通過其譯文影響讀者。

四、譯本分析

4.1 生態整體主義

如前所述，生態整體主義強調人與自然是一個整體，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與自然界其他成員是平等的，講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在原作中，倫敦描述人在面臨大自然時所展現出來的頑強生命力，並無營造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在這一點上，劉譯本相對接近原作，蘇譯本傾向把人與自然對立起來，把主人公塑造為受害者。

我們不妨來看蘇譯本中：1. 主人公“被絆倒”受傷；2. 受大自然的加害。我們將結合兩中譯本來討論。

(1) 主人公“被絆倒”受傷

例 1

ST : He stumbled from weakness and pitched head foremost on his face, cutting his cheek, his pack upon his back. (London 1907, 12-13) ^[1]

蘇譯：他的身體軟綿綿的，被腳下的石頭一絆，立刻朝下栽倒了，臉被劃破了，行李包壓在身上。（蘇福忠, 2016, 67）（蘇福忠, 2016, 67）^[2]

劉譯：他虛弱無力，一個踉蹌，便倒頭栽在地上，臉頰也劃傷了。他的行囊還在背上……（劉曉樺, 2014, 333）

故事中的主人公因長途跋涉糧盡彈絕而體力逐漸衰弱，因此頻頻跌倒。在兩譯本中，蘇譯本傾向于把主人公塑造為受害者的角色，他是“被”石頭絆倒，“被”石子劃破，被行李包壓在身上，而石頭、石子所代表的大自然是令他受傷的始作俑者。在這裡譯者用了被動式，說明主語被人家射及的情形（黎錦熙, 1924, 41），強調動作行為給當事人造成的影響，把責任轉移給了外界。這種結構強調的是受事主語的被動遭遇，即強調不是按自己意志遇到的行為（石毓智, 2015, 92）。而劉譯的“他……便倒頭栽在地上”，主語是動作的發出者，主動式的敘述說明了主人公的跌倒受傷，是他自己的行為，自己的責任，不受大自然的石頭所害。

除了以上例子，蘇譯本中譯文頻頻使用被動式，投射出對大自然的埋怨，把主人公的跌倒歸咎於大自然的加害。我們列表如下（表 2）。

例 2

表 3.2: 蘇譯本與劉譯本“跌倒”譯例比較

ST	蘇譯	劉譯
At nine o'clock he stubbed his toe on a rocky ledge (6)	差不多到九點鐘的時候，一塊大石頭絆了他一下…… (60)	九點時，他的腳趾踢到一塊礁石…… (325)
It was no uncommon thing now for him to stumble and fall (12)	一塊小小的石頭也能絆倒他 (66)	絆倒、跌倒已變成家常便飯 (332)
he fell squarely into a ptarmigan nest (12)	他被絆倒了，正好摔在了松雞窩裡 (66)	他跌進一個松雞窩 (332)
picking himself up grimly and patiently when he fell (12)	被絆倒了就再爬起來 (66)	摔倒了就不屈不撓重新爬起 (333)

(2) 大自然的加害

篇幅所限，筆者試舉以下兩例。

例 3

ST : The snow turned into a cold rain. He awakened many times
to feel it falling on his upturned face.(10)

蘇譯：雨雪完全變成了凍雨，淋在他裸露的仰躺的臉上，讓他睡不安生。
(65)

劉譯：白雪變成冰冷的雨點，他好幾次都被落在臉上的雨滴打醒。 (331)

例 4

ST : (At first he cried softly to himself,) then he cried loudly to the pitiless desolation that ringed him around; (10)

蘇譯：又對著無情的把他團團包圍的大荒野 號啕大哭了一陣。(64)

劉譯：然後開始對身邊這片殘酷的荒野 大聲哭嚎…… (330)

以上兩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兩譯者對大自然的不同態度和解讀。在蘇譯中，雨雪和荒野似乎是有惡意的，對主人公不利，例3的譯文讀來，是雨雪“讓他睡不安生”，例4中，譯文“無情的把他團團包圍的大荒野”更把主人公放在一個極度無助的位置，大荒野是無情的，而且把他團團包圍住，人處於一個孤立無援的地步。譯文營造一種人被“大荒野”逼迫的氛圍。而劉譯雖用了被動式（例3）和“殘酷”一詞形容荒野（例4），語氣卻相對平緩，並無一種人受自然界所害的氣氛。

4.2 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

在倫敦的小說創作中，常表現出消解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觀（段紅玉, 2013）。在《熱愛生命》中，作者同樣表達了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以“達爾文式的生存鬥爭”（Walcutt 1966, 44）展現了人類與野外動物的平等。在兩譯本中，蘇譯本缺乏批判人類中心主義的意識。劉譯本則接近原作，表達了消解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觀。

倫敦描寫人為了生存與食肉動物搏鬥，展示了人類頑強的生命力。小說中所表現的求生意志、人同自然的鬥爭乃基於達爾文的生存競爭學說，作者“不是從社會人的角度去找尋人物無比堅強的精神力量的根源，而是從生物人……的生命力、生的欲望去解釋”（彭啟華, 1982, 91）。因此，主人公此時作為一個生物人，身處荒野，與自然界的野生動物並無本質的不同，脫離了現代工業社會文明，他並不比野生動物更優越。兩譯本在呈現相關段落時，流露出對動物的不同態度。

人類例外論，也可理解為人類中心主義，此概念認為人類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物種，從根本上與動物界其他物種不同，並且比其他物種優越（Cronin 2017, 5）。這一概念使我們得以更加無情地去剝削大自然與其他物種，以便在星球上繼續主宰（Plumwood 2007）。人類例外論強調的是人類對自然擁有無限的權力（“power over nature”），而動物界則比人類低等。

我們發現，蘇譯本在用詞及敘事角度方面透露出這種立場。用詞方面筆者試舉以下兩例。

例 5

ST : In his weakness, what if the animal attacked him? (14)

蘇譯：他如此衰弱，要是那頭野獸 攻擊他，他該怎麼辦呢？(68)

劉譯：他目前虛弱地不堪一擊，若是那頭熊 撞擊他怎麼辦？(334)

例 6

ST: ([h]e knew the sick wolf clung to the sick man's trail in the hope that the man would die first.) In the morning, on opening his eyes, he beheld **it** regarding him

with a wistful and hungry stare. (17)

蘇譯：他知道那條病狼所以尾隨他這個垂死的人……當早上他睜開眼睛的時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個畜生 滿懷渴望的目光。(71)

劉譯：他知道那只病狼緊跟在他這個病人身後……早上他一睜開眼睛，就看到牠 用水汪汪的饑渴雙眼瞪著他。(339)

例 5 指代熊的 “the animal”，蘇譯為 “野獸”；例 6 指代狼的 “it”，譯為 “畜生”；而劉譯則相對中立地譯為 “熊” 和 “牠”。用野獸、畜生等詞，意味著把人類和動物劃分為不同的等級，人類站在生態系統的頂端，視狼和熊為獸、甚至畜生；這種視角以人類為中心，俯視熊和狼這些自然界的動物，體現了人類優越感。傳統的儒家素來有 “人禽之辯”，在道德層面認為人遠遠高於禽獸，“人性為善，禽獸之性為惡”（楊澤波, 2017, 35）。從社會人的角度看，這無可厚非，人優於禽獸，因人具有道德的屬性。然而在小說中，主人公身處荒野，糧盡彈絕，已是大自然生物鏈裡一普通的生物，在可怖的大自然面前，為了生存與其他野生動物展開廝殺，說不上比能這些動物更有優勢。蘇譯所用的 “野獸”、“畜生” 來指代熊和狼，流露出以人為中心的倫理觀。

例 7

ST : The bear edged away to one side, growling menacingly, himself appalled by this mysterious creature that appeared upright and unafraid.

蘇譯：熊慢慢向旁邊挪了一步，嘴裡發出威脅的低鳴，它被眼前這個站得筆直毫不畏懼的人嚇住了。(68)

劉譯：熊舉起一隻腳，身體傾斜一邊，發出駭人的咆哮。牠也被眼前這個神秘的東西嚇到。這玩意兒看起來像牠一樣直立站著，好像一點也不怕牠。(335)

35) 我們從小說的敘事模式的角度來分析以上例子。這包括原文和譯文如何表現人物話語或思維，表現方式與故事存在什麼樣的關係，造成什麼樣的敘事效果等（方開瑞, 2007, 60）。在這裡，人與熊展開了搏鬥，原文在提及主人公時，用的是 “this mysterious creature”，而不是 the man, 或 this person，由此可見，作者是從熊的認知角度來敘述，站在熊的角度，它並無所謂 “人類”的概念，對它來說，眼前的所謂人類是它不認知的莫名生物，是讓它感到困惑的 mysterious creature。

而兩譯本對此有不同的處理。劉譯忠實代入了熊的視角，把 mysterious creature 譯為 “神秘的東西” 及 “這玩意兒”，因熊根本不知道什麼是 “人”；但蘇譯卻直接譯為 “人”，這已不是從熊的認知角度所作的敘述。筆者相信，譯者此時作為讀者，觀察到這是發生在熊與 “人” 之間的搏鬥，而以全知的視角來敘述這事件了。方開瑞指出，

受中國古典小說以全知敘述模式為主這一傳統的影響，“譯者會將源本中的人物視角或外視角敘述模式，有意或無意地變為全知敘述模式。”（同上，58）

然而在此，我們必須指出，此處蘇譯的敘述模式，或緣於生態意識的缺乏。在看待野生動物時，譯者的視角或不自覺地以人類為中心，沒有以動物為中心，自然也就從“人”的視角而非“熊”的視角來看人熊之間的搏鬥了。如此，譯文即削弱了原作尊重大自然以及人熊平等的生態觀了。

4.3 生態審美

在生態審美方面，蘇譯本對大自然持一種相對消極的看法，甚少表現出對大自然事物的欣賞和審美。

“自然界是一個由各種自然要素構成的生態體系，其中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土壤、大氣、光、水等生物與非生物因素”。（臧樂源、張勝生，1998，32）我們發現，蘇譯在用詞及語氣上，較為負面，甚至流露出對自然界的敵意，而劉譯則語氣平緩、相對忠實。下面我們來看譯文對山谷、樹木、寒冬等自然界因素的呈現。

例 8（山谷）

ST：But at the crest he saw a shallow valley, empty of life. (5)

蘇譯：到了山頂上，往下看去，呈現在眼前的竟是一個死谷，不毛之地。

(59)

劉譯：但到了山頂後，他只看見一座死氣沉沉的淺谷，那兒一點生命跡象也沒有。
(324)

例 9（樹木）

ST：Farther on he knew he would come to where dead spruce and fir, very small and weazened, bordered the shore of a little lake (5)

蘇譯：再往前走，他就知道到了一個小湖邊，四周全是又細又小的死樅樹。

(59)

劉譯：他知道再走遠一點……有座小湖，湖岸散落許多雲杉和冷杉的細枯枝。
(325)

例 10（寒冬）

ST：And south, still south, they would go, while the winter raced vainly after them, and the ice formed in the eddies, and the days grew chill and crisp (6)

蘇譯：繼續往南走，這樣嚴冬就再也追不上他們了。

什麼湍流結冰，什麼寒風凜冽，去它的吧。 (60)

劉譯：儘管嚴冬緊追在後，漩渦處開始結冰，天氣一天比一天寒冷，但他們不會被追上。(325)

從以上例子，我們不難看到兩譯本語氣的不同。蘇譯本呈現出暴躁易怒的口吻：主人公的眼前“竟是一個死穀，不毛之地”，看到的又是“又細又小的死樅樹”；用咒罵的口吻“什麼湍流結冰，什麼寒風凜冽，去它的吧”，更體現主人公焦躁的心情和對大自然的不滿情緒。譯文讀起來，滿是主人公對自然界的厭惡。或許如翻譯學者 Hatim 和 Mason 所言，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會將自己的觀念、學識、態度輸入其本人所翻譯的文本中，“使譯文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譯者的精神面貌”（Hatim & Mason 1990, 11）。

而劉譯本的山谷“一點生命跡象也沒有”，看到“散落許多雲杉和冷杉的細枯枝”，寒冬中“天氣一天比一天寒冷”等等敘述，相比較之下，語氣都相對和緩，較為客觀地描述大自然的現象。

4.4 結語

本文從生態翻譯批評的角度分析了傑克倫敦《熱愛生命》的兩中譯本。生態翻譯囊括與環境變化發生關係的各種形式的翻譯活動，包括人類主導的翻譯思想和翻譯實踐，這些翻譯活動雖不起眼，但在某種程度上也反作用於環境。生態翻譯深刻體現了人文學科的生態意識和對地球環境的關懷。“我們必須清楚地來認識翻譯這項全球活動在人類世時代中所產生的實實在在的深遠影響”（Cronin 2017, 12）。

通過比較兩中譯本，主要分析生態整體主義、批判人類中心主義以及生態審美等三方面，我們發現蘇譯本沒能忠實呈現原文的生態觀，某種程度上扭曲了作者的生態思想與深層含義。其對大自然的負面解讀，在譯文中所傳遞的埋怨、對抗、甚至藐視大自然的生態意識偏離了作者與原文的本意。而劉譯本則相對忠實地傳達了原作的生態觀與意圖，其譯文的表達與敘述模式大致再現了原作關於人與自然的描述。

我們日常生活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被我們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倫理準則、判斷力和認知能力所左右。語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我們通過語言建構世界（黃國文、肖家燕, 2017, 16）。翻譯也是一種語言行為，對我們建構的世界自然會產生影響。雖說在翻譯的過程中，可以有衆多的因素影響譯文的產出，但筆者以為，最重要的莫過於譯者所起到的作用。譯者對大自然持有何種倫理觀和價值觀，直接影響著其譯文的產生。

翻譯作為語言轉換和傳播資訊的中轉站，決定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譯者的意識形態影響譯文的產生（Lefevere 1992, 44）。文化學派的翻譯觀認為，翻譯的過程就是重寫原作的過程，反映了譯者的意識形態（劉劍雯, 2016, 195）。譯者是“信息處理員”（Information Processor）（Watkin 2015, 176），在生態翻譯的領域，譯者如何將自己的生態意識融入文本，並將其帶進另一種文化、另一種語言，傳達給讀者，也在悄無聲息地影響讀者的生態觀和環境意識，進而從宏觀上影響更多的人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和塑造他們的環保意識。正如英國生態學者默頓（Timothy Morton）所說：“24000 年以後，沒有人會與我有任何有意義的聯繫，然而，萬物卻將會因我此時所做的一個細微決定而受影響。”（引自 Cronin 2017, 3）在如今地球已經進入人類世的時代，我們更應該思考翻譯這一人類行為所扮演的角色。翻譯研究

作為一門人文學科，不能無視人類生存環境的狀態和環境氣候的變化（Cronin 2017, 3）。翻譯和譯者都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一個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Stibbe 2015, 7）因為譯者的翻譯行為，能通過其譯文影響讀者，影響讀者大眾對自然環境的認知，進而影響人類對環境所做出的行為和未來環境的變化。

注釋

- [1] 方便起見，之後例子只標識出頁數，之後譯文及例子均採用同樣方式。
- [2] 粗體及底線為筆者所加。下同。

參考文獻

- Andone, Oana-Helena. 2002. “Gender Issues in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ology* 10 (2): 135-150.
- Baker, Mona. 1996.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 In *Terminology, LSP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Engineering, in Honour of Juan C. Sager*, ed. by Harold Somers, 175-186.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Castro, Olga, and Emek Ergun, eds. 2017. *Feminist Translation Studies: Local and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 Chakrabarty, Dipesh. 2009. “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 *Critical Inquiry* 35 (2): 197-222.
- Cronin, Michael. 2003.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Cronin, Michael. 2017. *Eco-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Ecology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London: Routledge.
- Crutzen, Paul J. 2002. “Geology of Mankind.” *Nature* 415 (6867): 23.
- von Flotow-Evans, Luise. 1997.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
- Garrard, Greg. 2004. *Ecocritici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Glotfelty, Cheryll, and Harold Fromm, eds. 1996.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Hatim, Basil, and Ian Mason. 1990.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London: Routledge.
- Kenny, Dorothy. 2017. “Lexical Hide-and-seek: Looking for Creativity in a Parallel Corpus.” In *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ed. by Maeve Olohan, 93-104. New York: Routledge.
- Kerridge, Richard, and Neil Sammells. 1998. *Writing the Environment: Ecocriticism and Literature*. London: Zed Books Ltd.
- Lefevere, André.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Levin, Jonathan. 1999. “On Ecocriticism (a letter).” *PMLA* 114 (5): 1095-1098.

- Liu, Aihua. 2011. "An Eco-translatological Perspective to Translator: A Case Study of Xu Chi."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1(1): 87-90.
- London, Jack. 1907. *Love of Life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 Macmillan.
- Love, Glen A. 2003. *Practic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 Plumwood, Val. 2007. "Human Exceptionalism and the Limitations of Animals: A Review of Raimond Gaita's The philosopher's dog." *Australian Humanities Review* 42: 1-7.
- Scott, Clive. 2015. "Working with the Notion of Eco-translation." Accessed May 30, 2017. <https://soundcloud.com/university-of-exeter/prof-clive-scott-working-with-the-notion-of-eco-translation>.
- Stibbe, Arran. 2015.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Tymoczko, Maria. 1998. "Computerized Corpora and 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eta: journal des traducteurs/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43 (4): 652-660.
- Walcott, Charles Child. 1966. *Jack Lond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Watkin, Christopher. 2015. "Michel Serres' Great Story: From Biosemiotics to Econarratology." *Substance* 44 (3): 171-187.
- 段紅玉（2013），“人類中心主義生態觀的深度消解——傑克·倫敦《荒野的呼喚》的生態解讀”，*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5：95-98。
- 方開瑞（2007），“敘述學和文體學在小說翻譯研究中的應用”，*中國翻譯* 4：58-61。
- 馮契、徐孝通（主編）（2001），《哲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黃國文、肖家燕（2017），“‘人類世’概念與生態語言學研究”，*外語研究* 5：14-17，30。
- 胡庚申（2004），《翻譯適應選擇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胡庚申（2011），“生態翻譯學：生態理性特徵及其對翻譯研究的啟示”，*中國外語：中英文版* 08 (6)：96-99。
- 胡庚申（2017），“若干生態翻譯學視角的應用翻譯研究”，*上海翻譯* 5：1-6。
- 胡志紅（2006），“文學生態中心主義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挑戰—生態批評對生態文學中‘放棄的美學’的探討”，*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3：94-99。
- 黎錦熙（1924），《新著國語文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 劉劍雯（2016），《性別與話語權——女性主義小說的翻譯》。香港：中華書局。
- 劉曉樺（譯）（2014），《野性的呼喚：傑克倫敦小說選》。臺北：如果出版/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 孟小果（2017），《生態中心主義型生態批評視閾下的〈格林童話〉研究》。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論文。
- 彭啟華（1982），“生之凱歌——讀傑克·倫敦《熱愛生命》”，*外國文學研究* 2：88-91。
- 石毓智（2015），《漢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 蘇福忠譯（2016），《傑克倫敦中短篇小說選》。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 隋麗（2008），《現代生態審美意識的生成與文本建構》。遼寧大學博士論文。
- 王諾（2007），《歐美生態批評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
- 許建中（2009），《翻譯生態學》。北京：三峽出版社。
- 楊澤波（2017），“新‘人禽之辯’”，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6（3）：35-39。
- 臧樂源、張勝生（1998），“人與自然關係的倫理思考”，理論學刊2：32-35。
- 張旭鵬（2019），“‘人類世’與後人類的歷史觀”，史學集刊1：46-51，78。
- 張豔梅、蔣學傑、吳景明（2007），《生態批評》。北京：人民出版社。